

批评的想象力

——重读特里林的《自由主义的想象》

刘雪岚

内容提要 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成名作《自由主义的想象：文学与社会文集》是其十六篇文章的合集，它主题多样，涉及历史、哲学、政治、文学、心理学、社会学诸多领域，集中体现了特里林利用文学的想象力来揭示与匡正美国自由主义机械僵化弊病的实践与努力。虽然这部出版于冷战时代的著作带有时代的特色与局限，但它机智辩证、文风优雅，其所传递的对于文学的信念，所展现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复杂与灵动，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与启迪。

关键词 莱昂内尔·特里林 自由主义 想象力 道德现实主义

—

出版于1950年的《自由主义的想象：文学与社会文集》（*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是美国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的第一部批评文集，那一年他四十五岁。虽不至大器晚成，亦非年少得志。

在此前的二十余年，特里林先以文学青年的姿态出道。尚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读本科四年级时，他就在犹太文化刊物《大烛台杂志》（*The Menorah Journal*）上发表了短篇小说《阻碍》（“Impediments”，1925），但他后来的文学创作，除了刊登在《党派评论》（*The Partisan Review*）上的两个短篇小说《此时彼地》（“Of this Time of that Place”，1943）和《另一个玛格丽特》（“The Other Margaret”，1945）较为成功，其他均反响平平。尤其是他最为期待的长篇小说《旅途中》（*The Middle of the Journey*, 1947），被评价为呆板机械，概念先行，不具备艺术才华，这或许也间接导致他从此完全转向批评，放弃了当小说家的梦想。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许正因为文学青年特里林的失利，才造就了美国文学思想史上的批评大家特里林。特里林于192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曾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和纽约亨特学院短期执教，后于1932年受聘成为哥伦比亚大学

英文系讲师，同时进行博士论文写作。其后他虽经历解聘风波，但在1939年凭借完成并出版的博士论文《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得到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的赏识，从而获得永久教职，成为哥大英文系历史上第一位犹太助理教授。在之后的十年间，特里林发表了不少颇具影响的评论文章，其中十六篇构成了他的成名作《自由主义的想象》。他在1943年出版的专著《爱·摩·福斯特》（*E. M. Forster*）可视为他对美国自由主义批判的先声，他对福斯特文学创作中道德想象力的探究和称道在大洋彼岸的英国评论界也博得了高度认同。在《自由主义的想象》发表后的二十五年里，特里林又出版了三部评论文集：《对抗的自我》（*The Opposing Self*, 1955），《散篇拾缀》（*A Gathering of Fugitives*, 1956）和《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 1965），以及他在哈佛大学的诺顿讲座集《诚与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1972）。特里林于1952年成为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6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荣誉博士，并于1964至1965年和1972至1973年间两度成为牛津大学的访问教授，其学术声誉在七十年代达到顶峰。1970年特里林成为执教近四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名校级教授之一，同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将他列为美国当代十大杰出知识分子之一，1972年他成为托马斯·杰斐逊人文奖（The Thomas Jefferson Award in Humanities）的首位得主。当特里林1975年在纽约辞世时，《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发悼文，从“批评家、教师和作家”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他的一生，称赞在他的笔下，批评不仅仅是对文学作品本身的讨论，还关注作品所承载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和理念对于它们所产生的社会的关系和意义。《泰晤士报》上的讣告称他为“占据重要地位的文学批评家”。他的哥大同事、批评家斯蒂文·马尔库斯视他为“我们道德生活中的历史学家，文化上的哲学家”^①，并认为他的去世使美国思想界失去了一位领军人物，甚至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二

“自由主义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特里林评论福斯特的专著中。在此书的再版序言中，特里林明确指出，他1943年写作此书是因为他和当时的美国文学有场“争吵”，因为当时的美国文学患有“呆板和虔敬的社会幼稚病”，而福斯特小说的“活泼、复杂、嘲讽”恰可作为疗治良方。特里林认为福斯特

^① Steven Marcus, "Lionel Trilling, 1905-1975", in Anderson, Quentin, Stephen Donadio, and Steven Marcus, eds., *Art, Politics, and Will: Essays in Honor of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277.

的思想深深浸润在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他的小说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主义的各种教义，尤其对于代表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观念如进步、集体主义和博爱思想等，福斯特却一直持审慎与对抗态度，而这正是因为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缺乏想象。^①

对于自由主义缺乏想象的批评由此成为特里林在四五十年代的思想主旋律，也是《自由主义的想象》一书的重要线索和内在逻辑。特里林在文集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在美国，当时自由主义不仅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甚至是唯一的传统，但一个社会或文化里只有一种主导思潮并非好事，它很容易变得僵化和教条。自由主义的使命本来是预想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及其可能性，而且始终把幸福的观念置于中心，但特里林警告说，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能总是试图通过组织来表达自己，而组织就意味着团体、机构和部门。最后能经过组织而幸存的观念，通常都变成某种简单、固定的东西，丧失了原有的那些广博、变化和复杂的品质。那些生动鲜活的偶然、可能和例外的感觉是无法适应组织性的冲动的。因此特里林认为，自由主义原初具有的想象力和目前的具体表现之间产生了断裂、矛盾。由此也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并非天生缺乏想象能力，而是其政治性冲动及在美国的发展导致它日渐机械僵化，丧失了想象的活力。

对于如何恢复自由主义的想象力，特里林说经验告诉我们，通常一种思想只有面临危机或挑战时，才最有可能思变并寻求创新，因此如果存在一种能与自由主义相对立或抗衡的强大思潮，那对自由主义的自我批评、反思和修正都将是有益的压力和促进。特里林从英国十九世纪的思想传统中找到了穆勒（John Stuart Mill）论柯勒律治的著名例证。身为自由派的穆勒，无论在思想还是政治上，都与保守主义的柯勒律治站在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但他却呼吁所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都去了解这颗保守的深邃心灵。他认为自由主义同仁们的祈祷词应该是：“主啊，启蒙我们敌人的心智吧！”穆勒甚至提倡应该让对手的智慧变得锋利尖锐，让他们的感知变得敏锐精确，让他们的推理变得连贯清晰，因为“是对手的愚蠢，而不是他们的智慧，让我们陷入危险；是对手的虚弱，而不是他们的强大，让我们充满忧惧”^②。穆勒的意思就是说虚弱的对手会让人轻视并变得自满，只有像柯勒律治那样强大的对手所带来的思想压力才能促使自由主义者反省自身的缺陷和自满。不过，特里林进一步阐明，自由主义者也不能坐等来自对手的压力以促进自身的完善和修正，这会让自己的思想变得陈腐、僵化，毫无活力。

① Lionel Trilling, Preface, in Lionel Trilling, *E. M. Forster*,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2.

② Lionel Trilling, Preface,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2008, p. xvi.

那么自由主义该如何主动医治自身缺乏想象的弊病呢？特里林开出的药方是：文学。他说，美国自由主义需要被唤醒其最基本的关于多样性和可能性的想象，也就是对于复杂性和困难性的意识。这种想象与意识的能力只能来自于文学。不仅仅因为大量的现代文学直接关涉政治，更重要的是，“文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的最全面，也最准确的记载”^①。

《自由主义的想象》正是特里林用文学的想象力来匡正美国自由主义僵化弊病的实践与努力。全书所收的十六篇文章均发表在1940至1950年之间，由特里林亲自挑选，并未囊括他这十年间发表的全部文章，原因或如他在序言中所说，所选文章虽然主题庞杂多样，但有某种有机联系，这个内在关联就是他对于自由主义的关注，“尤其是自由主义思想与文学的关系”^②。不过特里林在《自由主义的想象》中，并未对“liberal”一词给予明确定义，在谈到对美国自由主义的理解时，他的概念也经常是宽泛模糊的。在《爱·摩·福斯特》的序言中，他把自由主义传统定义为“一套松散的中产阶级观念，包括进步、集体主义和博爱主义。”它代表着特里林对进步、人道主义、人权和民权、黑人当然还有犹太人的平等地位的一种信仰。它是部分政治的、部分道德的、部分社会的。从书中文章可以看到，经常出现的特里林式术语有心智（mind），风俗（manner），意念（will），以及复杂（complexity），困难（difficulty）和多样性（variousness）等，这些概念与自由主义的想象力相互补充，甚至成为代名词。同时，从书中文章也可看出特里林的“文学”概念也是广义的，几乎等同于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 1869）中的“文化”一词，因为这些文章涵盖了历史、哲学、政治、文化、艺术、心理学、社会学诸多领域，特里林不仅把目光投向德莱塞、安德森、詹姆斯、马克·吐温和菲茨杰拉德，他从帕灵顿、塔西佗、弗洛伊德、小众杂志和金赛性学报告中也同样找到了灵感。

《自由主义的想象》的首篇文章叫做《美国的现实》，亦可视为定调之作。因为当时现实主义正是美国文学和思想的主流，特里林开篇就挑战这个“现实”，这也正是他在论福斯特的书中所说的与美国文学的“争吵”。他首先拿美国文化历史名家帕灵顿（V.L Parrington, 1871—1929）和他的《美国思想大潮》（*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1927）开刀。这套获得普利策奖的三卷本思想史巨著因其颇具影响的现实主义观几乎成为美国民族文学研究的标准和指南。对帕灵顿来说，现实就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整体，它完全是外在客观的。人的心灵可以犹疑动摇，但现实是永远可

① Lionel Trilling, Preface,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 xxi.

② Lionel Trilling, Preface,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 xv.

靠、永远不变、永远可感知的。既然现实是固定和先在的，那么艺术家和它的关系就简单了，艺术家只需当个透镜让现实通过即可。特里林认为，帕灵顿眼中的艺术家，除了成为让现实穿越的透明通道之外，与现实再无其他可能的关系，所以他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都抱有敌意，认为它们是民主的天敌。因此特里林评价说，帕灵顿不能充分地理解浪漫主义，他的现实主义国度排斥爱伦·坡的怪异，怜悯霍桑的乏匮，贬低麦尔维尔和詹姆斯的逃避主义，他代表的正是自由主义的文学学院派，认为现实与思想存在对立关系，人们必须加入到现实的阵营来。^①

《美国的现实》是特里林两篇文章的合体。第一部分曾于1940年发表在《党派评论》上，主要通过讨论帕灵顿的现实观来批评美国自由主义的狭隘与僵化。第二部分则于1946年刊发在《国家》杂志，主要通过美国评论界对德莱塞的评价以及与詹姆斯的对比来剖析自由主义的幼稚病。特里林说，评论界偏爱德莱塞而非詹姆斯，因为德莱塞小说的窘迫、混乱、笨重，就像现实的化身。在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中，现实总是物质性的：艰难、抗拒、尚未定型、难以把握、也令人不快。尽管自由主义批评家也认可詹姆斯的卓越天赋和这种天赋所带有的宏伟的道德意图，但这种天赋及其意图有什么实在的政治用途呢？如果詹姆斯的小说没有立竿见影的政治效应，那么美国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就不会承认他，而德莱塞恰好在这方面成了批评家们的宠儿。^②

特里林指出，自由主义的批评家们和德莱塞的思想“一拍即合”，沉醉其中，难以自拔。德莱塞的文学缺陷变成了最本质的社会和政治的美德。他的小说的确是“笨拙”“愚蠢”“粗俗”和“昏惑”的，但是可以被接受、被宽宥，因为他的缺陷就是现实本身的悲哀的、可爱的、可敬的缺陷。或者说就代表了美国本身：巨大、不成熟，竭力表达却身陷原始蛮力的梦想和道德梦想之间动弹不得。在分析了德莱塞的文风（呆板、华丽、粗俗，充斥着花哨的辞藻，闪耀着人造宝石的光彩）之后，特里林发问，德莱塞的思考判断既模糊又笨拙，他所卖弄的虚无主义，也不过是用来显示深刻的唬人姿态而已，可为什么就没有哪位自由主义批评家质疑他的小说的政治时效性呢？特里林的解答相当不留情面，他说那就是因为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总是毫不迟疑地表现出诚实的愚蠢，却钝于心智；总是不假思索地表示正义的、令人迷惑的愤怒，却钝于理解；总是轻而易举地做出天真的道德评判，却钝于思考。由于时代的迫切发展，我们往往去贬斥那些最出色的头脑，却宽宥了愚蠢糟糕的心智”^③。

① Lionel Trilling, "Reality in America",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3-10.

② Lionel Trilling, "Reality in America",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11-21.

③ Lionel Trilling, "Reality in America",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 18.

为了修正德莱塞式自由主义文学的弊端，特里林给出了自己的代表和药方，那就是霍桑、麦尔维尔和詹姆斯，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辩证的自由主义。特里林认为在任何一种文化中，总有一些艺术家是能够辩证地看世界的，他们的意义和力量正是来自于他们的矛盾与复杂。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就在于这些艺术家不会供奉或臣服于任何一个意识形态集团或潮流。十九世纪的美国曾有过一大批这样辩证的作家——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既肯定（yes）又否定（no），凭此标志，他们成为未来的先知。

作为描写和揭示现实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出色例证，特里林又推出菲茨杰拉德作为反德莱塞式现实主义的样板。他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话来为他举证，即检验上乘智慧的标准，是看一个人能否在心灵中同时拥抱两个相左的理念，而不失去行动的能力。特里林认为菲茨杰拉德恰恰就具备这样的能力。他天生懂得冷眼嘲世，但在他的道德姿态里，我们感受到他更倾心于称扬善的东西，而不是谴责恶的东西。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茨杰拉德并没有将盖茨比（或他自己）的悲剧归咎于时代。虽然他意识到人物的命运和所处的社会性质息息相关，但并没有将个人的苦难一股脑儿地堆放在“社会现实”的门前。菲茨杰拉德始终让个人意志与环境之间保持着微妙的紧张关系，这反映了他的道德气量和思想活力。特里林还引用小说开篇尼克父亲对尼克的教诲，说在叙述者的声音里，我们听到了对人类欲望的怜悯，而这使得坚定的道德判断有所迟疑。特里林认为，（菲茨杰拉德）这样的叙述声音蕴含着谦逊，宽容，乃至庄严，是小说理想的声音。^①

在《感悟过去》（“The Sense of the Past”）和《今日塔西佗》（“Tacitus Now”）两篇文章中，特里林与托·斯·艾略特和塔西佗产生了共鸣。他认同艾略特的历史与传统观，质疑美国新批评派割裂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将文本视为自足的整体。他说文学就是历史的艺术，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总是对历史的研究。任何诗人的作品，其存在都是一种与过去的联系，无论是继承还是背离。即使被称作创新也只是意味着它与传统的一种特殊关联。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历史观也得到特里林的响应，因为塔西佗认为历史也是文学，它应以打动人心的方式来述说过去。塔西佗阐释历史的方法正是把历史当作文化活动、当作过去的延续，而不是一系列独立分裂的事件。

此外，特里林从科技领域也发现了自由主义缺乏辩证思想和想象的例子。他通过评论当时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性学报告《金赛报告》，揭示出科学理性的狭隘与自负。他说报告作者把性行为从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中抽离，认为它只是一种自为可控的、纯粹肉体的行为，它不具备社会属性，不涉及任何个人的或文化的意义，唯一的决定

^① Lionel Trilling, “F. Scott Fitzgerald”,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243-253.

因素就是越多越快乐的数量原则。由此金赛报告缺乏想象力，否定了性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它无可逃避地所具有的道德意义。^①

《小众杂志的作用》是特里林为《党派评论》杂志十周年选集作的序。他首先回顾了杂志的业绩及其对美国思想文化生活的影响，然后在对现实的忧虑中，他擎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威廉·迪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用他童年生活的俄亥俄州和马克·吐温生活的密苏里州，来追忆美国十九世纪的理想文学生活图景。那时无无论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是政治家，都需掌握一定的文学才能，甚至在中西部的偏远小城，人们的生活也充满了智性和文学色彩，可谓“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而现在文学却变得与这些专业毫不相干，文学式微正是因为美国的受教育阶层和最好的文学之间出现了鸿沟。特里林这里所指的受教育阶层就是那些认真思考、重视生活品质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自由主义者。特里林举出了最好文学的反例，那就是大量的反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抗议小说。尽管它们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它们既没有想象也没有思想，唯一有意义的也就是它们的诚挚、真实和严肃的品质。特里林又举出被美国自由主义所排斥的欧陆文学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叶芝、托马斯·曼、卡夫卡、里尔克和纪德。对这些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摒弃和漠视正反映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和想象的分裂。所以《党派评论》的十年办刊经验说明要修正此种弊端，必得坚持政治活动一定要和心灵的想象相结合。^②

在特里林的批评思想中，另有一核心概念与“liberal imagination”几可相互替换，那就是“道德现实主义”（moral realism）。也是在论述福斯特的专著中，特里林首次提出这个概念，他说所有的小说家都关注道德，但并非所有的小说家都关注、反映或理解了道德现实主义。所谓“道德现实主义”，并非是对道德本身的意识，而是对道德生活所蕴含的“矛盾、悖论和危险”的充分认识。在本书的《风俗、道德与小说》（“Manners, Morals, and the Novel”）《卡萨玛西玛王妃》（“The Princess Casamassima”）以及《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几篇文章中，特里林多次提及“道德现实主义”。他说道德并不是某个政治党派的简单律令，相比其简单的标语口号，由财富、阶级和势利所表现出的社会风尚和品质，更能呈现道德生活的丰富内涵。“道德现实主义”是一种对宏大问题的辩证认识，而非一种固定的、终极的判断，是一种在矛盾中维持的平衡。换言之，就是一种关于复杂的

① Lionel Trilling, “The Kinsey Report”,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223-242.

② Lionel Trilling, “The Function of the Little Magazine”,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93-103.

想象，其关键词就是困难、灵活、多样、矛盾、悖论和可能性。在高度赞赏詹姆斯在《卡萨玛西玛王妃》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复杂刻画时，特里林将“道德现实主义”解释为一种关于灾难的想象力，同时也是一种爱的想象力。^①

《自由主义的想象》不仅贯穿着特里林对于美国自由主义的批判与匡正，也展现出他对于精神分析学说应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既审慎又辩证的态度。在《弗洛伊德与文学》中，他说，“即便我们承认精神分析理论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两者的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弗洛伊德对于文学的影响并未超过文学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②。特里林一方面认可精神分析对于文学批评的适用之处，例如可以解释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解释艺术家的个人气质；一方面又敏锐地指出其局限与不足。他以弗洛伊德的弟子恩斯特·琼斯（Alfred Ernest Jones）对《哈姆雷特》的分析为例，辨析说尽管琼斯医生运用俄狄浦斯情结解析了哈姆雷特的“延宕”问题，但一出戏剧的意义不可能仅仅决定于作者的主观意图，它还取决于戏剧效果。《哈姆雷特》不仅是莎士比亚思想的产物，也是他思想的工具，如果意义就是意图，那么莎士比亚并非仅仅以俄狄浦斯主题为《哈姆雷特》的意图；如果意义也是效果，那么是《哈姆雷特》对我们产生影响，而不是俄狄浦斯主题。^③在《艺术和神经官能症》一文中，特里林再次指出，弗洛伊德把艺术创造看作是艺术家的替代性满足是偏颇的。从神经官能症上寻找艺术家天才的源泉和创造力的根基也是无稽之谈。作家的心理机制和普通人并无二致。从广义上说，精神分析学说视每个人都有神经官能症表现。作家会被视为神经质的原因，特里林解释说，是因为作家对人的内心探究更深、讲述更多，另一原因是作家总会大量写作信函、日记和自传。换言之，科学家或许也是神经质的，只是不外露而已。特里林进一步辨析说如果认为神经官能症等同于创造力，那么就该将其应用于一切领域。逻辑学家、经济学家、植物学家、物理学家、神学家——没有哪个职业是如此显贵或如此生僻或如此理性，而不适用于心理学的阐释。同理，不仅是创造力，失败和局限也同样可以用神经官能症理论来解释，而且不仅是生活中的失败和局限，甚至是艺术的失败和局限，都可以用神经官能症来阐释。特里林的结论就是艺术家的心理并不殊异于常人，艺术家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他本人是否有创伤经历，而在于他的独特视角，在于他的创造力，能再现每个人都可能有的创伤经验。^④

在特里林的批评思想中，对文学的政治属性的认识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他批判自

① Lionel Trilling, "The Princess Casamassima",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58-92.

② Lionel Trilling, "Freud and Literature",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 34.

③ Lionel Trilling, "Freud and Literature", pp.34-57.

④ Lionel Trilling, "Art and Neurosis",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160-180.

由主义弊病的重要武器。但他的“政治观”又是广义、宽泛的，而非狭义上的政治。他认为个人对无限自由的渴求，总是遭到要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文化的否定或压制，政治便是应对这种永恒紧张关系的一种方法和态度。文学和艺术都深含政治寓意，尤其是面对社会体系的制约时，个体的独立自主即承载着政治寓意。对特里林来说，不存在完全不具备政治属性的文学，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来谈文学。他在《美国的现实》第二部分开篇就直言，当我们把德莱塞和詹姆斯两位作家并置审视，立刻就处于文学和政治所交汇的、黑暗而血腥的十字路口，这已不是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的道路。思想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总是交织缠绕、相伴相生，所以特里林明言他收在《自由主义的想象》中的文章虽然是文学批评，但它们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了文学与政治之间无可避免的亲密关联。

三

《自由主义的想象》成书于1950年，收录的文章跨度十年，正逢二战后的冷战时代，因此也被称作冷战之书。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冷战已过，苏联解体，柏林墙亦倒，全球化与资本的时代或许贸易战反成热点。世界的对峙或格局早已易弦更张，文学批评的世界也已面目全非，连特里林时代尚未风靡的解构与后殖民，都已成明日黄花。很多跟他齐名的大师们虽名声犹存，文章却已少人问津，那特里林这些带着时代标识与思考特色的评论文章又价值何在呢？笔者在二十年前开始关注特里林时发现，英美学界对他的研究自七十年代开始，持续十余年，几部重要的研究专著都出现在八十年代末，此后在席卷美国的理论潮中这一研究几乎销声匿迹，甚至连高校的文学研究生们都不再知道特里林是何方神圣。但从新世纪开始，对于特里林的关注再次复苏，先是《新共和》杂志的编辑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 Wieseltier）于2000年编辑出版了特里林的论文精选集《知性乃道德职责》（*The Moral Obligation to Be Intelligent*）^①，随后在2005年特里林的百年诞辰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在保守派的《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上发表纪念文章《特里林的想象力》（“*The Trilling Imagination*”），称特里林为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知识分子，他的批评遗产无论对于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都弥足珍贵。次年希梅尔法布出版专著《道德的想象力：从埃德蒙·伯克到莱昂内尔·特里林》（*The Moral Imagination: From*

^① 译林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此书的中译本《知性乃道德职责》，同年还翻译出版了特里林为自己编选的文学作品读本所写的导读汇编《文学体验导引》（*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A Reader with Commentaries, 1967*），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五部“纽约知识分子”研究专著，均由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论文修订而成，其中《莱昂内尔·特里林》一书为严志军所作。此外，江苏教育出版社早在2006年就出版了《诚与真》的中译本，译者刘佳林。

Edmund Burke to Lionel Trilling)，讨论了英美历史上的诸多重要人物，有哲学家伯克，穆勒和奥克肖特 (Michael Oakeshott)，政治家迪斯累利 (Benjamin Disraeli) 和丘吉尔，文学家奥斯丁、艾略特和狄更斯，以及《经济学人》主编白芝浩 (Walter Bagehot)。特里林出现在最后一章，他所沿袭和倡导的由伯克在两百多年前所倡导的“道德想象力”，成为所有这些先贤思想的重要标识。^① 2011年，年轻的纽约批评家和诗人亚当·基尔希 (Adam Kirsch) 出版了《特里林为什么重要?》 (*Why Trilling Matters*)，获得评论界广泛关注，著名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兹克 (Cynthia Ozick) 称赞基尔希的研究出色地把握了特里林那复杂、紧张却又谦逊的批评精髓，堪称特里林的真正传人。2018年，基尔希又编选了《文化人生：特里林书信选》 (*Life in Culture: Selected Letters of Lionel Trilling*)，试图更全面地还原大师风貌及其生活的年代，那是文化批评可以引领风尚的时代。英美学界在新世纪后对于特里林及其所代表的批评传统的重新关注与审视，或许反映出后理论时代文学批评的审美与伦理回归以及文化批评的再次兴盛。

当然时过境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各派批评理论的轮番洗礼，如今再回顾特里林的文学批评，重读《自由主义的想象》，他的局限也是明显的。譬如他过于关注文学的思想性，难免轻视文学的审美维度；他推崇很多小说家，对诗歌不免兴味索然。他一生唯一评论过的两位诗人济慈和华兹华斯，吸引他的仍是他们的思想，而非具体诗作；是他们思想的道德品质，而非诗作的艺术特色。曾有评论家质疑他的文学批评变成了社会批评或思想史论，说在他笔下，济慈成了知识分子，华兹华斯成了思想家。的确，特里林的批评表述清晰、语言优美、判断审慎，但他倾向于概括式的分析和判断，很少进入具体文本和细节，这也让他招致不少诟病，丹尼斯·多诺霍 (Denis Donoghue) 就曾嘲讽说，特里林先生的典型做法是只见段落不见词句，只见评判不见例证。他不需要寻章摘句，因为他最喜欢讨论的就是风俗 (manner)，最幸福的就是漫游在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 (依此排序) 的广阔三角地。^② 此外，特里林文章中最常用的主语“我们” (we) 亦引发质疑，这个“我们”到底是特里林心中的理想读者，还是跟他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少评论家都把《自由主义的想象》看作特里林最重要的代表作，但他的妻子，同为“纽约知识分子”的戴安娜·特里林 (Diana Trilling) 却更愿意把它看作特里林整个批评思想体系的“绪论” (introduction)。她说在超越五十年代过于具体的政治文化语境之后，特里林的思想

① 在此书2012年的第二版中，希梅尔法布又增添了三位人物，分别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Adam Smith)，自由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阿克顿勋爵 (Lord Acton) 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书名也变成了《道德的想象力：从亚当·斯密到莱昂内尔·特里林》。

② Denis Donoghue, "The Critic in Reac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58. 944 (Oct. 1955), pp. 378-383.

不论是在表达还是隐喻方面都日渐深邃和丰富。^①的确，特里林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的思考与质疑，要留待在《对抗的自我》和《超越文化》中才有更丰满的展现。

四十多年前，特里林带着至尊的学术荣耀辞世，也在某种意义上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在他那些机智辩证却又复杂优雅的文章中，闪耀的是对文学的永恒信念，展现出批评具有的巨大想象力。1970年代，面对欧陆批评理论在美国开始盛行，特里林写过一篇序言《什么是批评》（“What is Criticism?”）。他承认，在各种纷杂的批评理论中，认为文学是由其道德力量决定的观念早已没有地位。但他接着又说，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它依然很有活力。就像他虽然也认同新批评的形式主义者呼唤“回归文本”，但更相信“某些文学的特殊时刻，其力量的秘密靠语言和形式研究是无法揭示的，因为这种力量靠的不是语言、不是形式，靠的是道德的想象力”^②。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想象》带着时代的特色与局限，仍能超越时空成为经典之作。它的精装本累计售出七万册，平装本销量超过十万册，创下文学批评著作的销售记录。笔者重读的版本是此书的第六个版本，也是截止目前的最新版，2008年由著名的“纽约书评经典书系”出品，由哈佛大学的思想史名家路易斯·梅南德教授作序。此序言是梅南德同年发表在《纽约客》上的长文章《只有懊悔：莱昂内尔·特里林及其不满》（*Regrets Only: Lionel Trilling and His Discontents*）的删节版，文章副标题特意仿照特里林最喜欢的弗洛伊德著作《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梅南德的硕士和博士皆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他在文章中回忆说他选择哥大英文系，就是为了感受特里林的风范，想做他那样的批评家。梅南德说他坚信哥大英文系所传授的：文学就是思想史的一部分。人们创作小说、戏剧和诗歌，就是为了传达人生体验；文学就是思想，就是文化，它赋予人生以意义。^③

“文学就是人生的批评”是特里林的精神导师马修·阿诺德的名言，它经由特里林又传承给梅南德。每一代批评家都是传统的一部分，但在继承的基础上也在开创着新传统。这或许也是重读《自由主义的想象》的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

① Diana Trill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Journey: The Marriage of Diana and Lionel Trilling*,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3, p. 403.

② Lionel Trilling, ed., “Introduction”, in Lionel Trilling,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70.

③ Louis Menand, “Introduction”, in Lionel Trilling,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pp. vii-xiv.